

【头条评论】

# 中国发展AI产业须打好三张牌

韩和元

全球人工智能(AI)竞赛正从技术突破的“短跑冲刺”转入生态构建的“耐力长跑”。当算法创新进入瓶颈期,算力成本、数据质量与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变量。中国要在这场马拉松中率先撞线,不必执着于“弯道超车”,而应深耕自身优势,将“绿电+国产芯”、“数据活水”、“场景下沉”这三张“大众牌”锻造成制胜“王牌”,走出一条兼具技术突破与民生温度的特色发展之路。

算力是AI发展的“粮食”,但高昂的能耗成本与芯片供应限制,正成为制约全球AI产业的两大枷锁。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将新能源优势与自主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低成本、高安全的算力供给体系。数据中心的“西迁”战略正在重塑算力成本格局。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光伏产业园里,一排排蓝色光伏板与数据中心的散热风扇交相辉映,这里的电价仅为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一;内蒙古的风电基地旁,超算中心依托每度0.2元的绿电,将大模

型训练成本直接压缩七成。这种“风光富集区建机房”的模式,不仅让中国算力具备天然的成本优势,更顺应了“双碳”时代的全球共识——当欧美数据中心为碳中和目标支付高额碳税时,中国的绿电算力已提前站在了道德与经济的双重制高点。芯片自主化则是突破技术封锁的必由之路。面对高端芯片进口限制,中国企业创新推出的“积木式”芯片集群方案颇具启发:通过先进封装技术将国产14纳米芯片组合,等效实现3纳米级算力性能,既避开了单一芯片制造的技术壁垒,又将大模型单次训练的电费从千万元级降至百万元级。这种“抱团取暖”的创新,不是技术妥协,而是产业智慧。绿电与国产芯的结合,正在创造“1+1>2”的化学反应。

数据是AI成长的“营养液”,但“数据孤岛”与“安全隐患”的双重困境,让海量数据难以转化为创新动能。中国拥有10亿网民、4亿工业设备的超大规模数据基数,若能打通数据流通的“任督二脉”,就能为AI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打破“部门墙”“行业壁垒”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前提。上海数据交易所探索的“行业数据空间”模式颇具示范意义:医院的诊疗数据、工厂的设备运行数据、地铁的客流数据被纳入统一平台,通过“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加密技术,实现像自来水一样“即开即用”,却又能精准管控数据流向。这种模式既解决了企业“数据饥饿”的痛点,又守住了数据安全的底线,让沉睡的数据真正“活”起来。

数据流通的创新实践正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深圳建立的“数据要素市场”,让新能源汽车企业与充电桩运营商的数据交叉验证,大幅提升了电池续航预测精度;杭州的“城市大脑”整合公安、交通、气象等多部门数据,使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15%。这些案例证明,当数据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共资源”,其催生的创新能力将呈几何级增长。中国的制度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恰恰为这种数据流通创新提供了最佳试验场。

AI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实验室里的论文与参数,而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具体问

题。中国最独特的优势,在于拥有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的全场景应用土壤,让AI能够在烟火气中完成从“玩具”到“工具”的蜕变。

场景下沉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在北京的社区菜场,AI摄像头通过交易数据与客流量分析,知道哪些菜品畅销、哪个时段人流密集,进而指导市场调整摊位布局、优化营业时间;在山东的农田里,农民用手机拍摄麦苗照片,AI系统能提前一周识别病虫害趋势,从而有效降低农药使用量,确保农户增产增收。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恰恰体现了AI对生产力的实质性提升——它不必追求“高大上”的技术炫技,而是要成为每个普通人都能用、都能用得起的“生产助手”。与此同时,场景下沉也在反向驱动技术创新。

这三张“大众牌”的落地,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引导。既需要为创新留足试错空间,又要防止无序发展造成的资源浪费,关键在于把握“放”与“管”的平衡艺术。期待政策有为善为,与市场结合,共同促成中国AI产业达至美好的愿景。

【法治之道】

## 家族信托设立合规才不会被击穿

蒋光祥

近日,江苏南通发生一起家族信托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该案中,犯有行贿罪和合同诈骗罪的当事人4000多万元信托资产被当作“存款”划扣,在金融与法律界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叠加之前另一起被报道的山东聊城非法行医的当事人1000多万元违法所得从家族信托中追缴——让这些本应具有独立性的财富安排,沦为“一纸空谈”。作为家庭信托主要营销对象的高净值人群,本就对家族信托似懂非懂,对家族信托是目前国内财富传承最佳路径(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的自有财产,这一特性使家族信托成为债务隔离、财富传承的理想工具)之营销话术,本也是将信将疑,现在看到该类信托的主打卖点全身被破,自然可能会对家族信托的投资安排不那么积极。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家族信托这一舶来制度的本土化困境。

仅从现有偶发个案来看,笔者对家族信托前景的看法倾向乐观。上文提及的南通案,不排除存在乌龙与误会的可能。这从法院划扣被告名下“委托第三方代理的家族信托基金”的表述就能看得出来,业内人士对这个表述首先就无法理解。毕竟,代理是保理(简单理解就是用应收账款来融资),完全不能等同于管理;信托是信托(如XX信托·定制型家族信托);基金是基金(如XX股票型证券投资公募基金或私募基金),不会有家族信托基金。

当然,不管是基金还是信托,客户在购买的那一刻,其资金来源必须经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检查,但反洗钱检查注重的是核查客户身份识别、资料保存、大额可疑交易报告等,如果资金来源违法,金融机构当时很可能无法识别,因为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事后被查出。倘若家族信托设立的时候,就已知客户违法,那么这个家族信托也根本就不会成立。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击穿的这两个家族信托案例都存在用不当得利或者用非法所得来设立信托的瑕疵。

笔者仍然坚信,只要客户财产来源合法合规,就不存在被击穿的风险。法律对此也早已构建了防范机制,《信托法》明确规定设立信托的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以非法财产设立的信托自始无效;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这些规定为打击恶意避债提供了充分法律依据。

以聊城案为例,路某在设立家族信托时就已在违法行医。因而,资金具体来自于哪部分合法来源,的确难以区分。细读法院将其所设家族信托等同于非法所得的原委,路某又并非天然占理,因为其被判罚后的罚金,非划扣家族信托不足以覆盖。

但是,乌龙与误会的另一面,是司法机关在类似案件中往往缺乏对信托法律关系的细致分析,司法实践中如果倾向于跳过这些法定程序,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穿透信托,这种结果导向的简单处理既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也可能伤及无辜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完全可以在认定犯罪事实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审查信托效力。也就是说,家族信托不是不可以击破,有序即可。如果先破上层信托,再予以追缴信托资产,就合理许多。从国际经验看,信托穿透执行也有先例,如新加坡高等法院击穿张兰家族信托案。

总而言之,家族信托被滥用用于逃废债务的风险确实存在,但这不应成为否定其合法功能的理由。信托价值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被放任纵容制度滥用。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设立家族信托时更应注重合法合规,避免将来源不明资金注入信托架构,否则可能面临信托被穿透的巨大风险。

【时代风口】

## “中国节水奖”引领全民节水新风尚

张连洲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水利部近日印发《中国节水奖评选表彰办法》,开展首届评选表彰工作,日常工作由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负责。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水资源供需矛盾尤为突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评选表彰“中国节水奖”,不仅是对节水工作的肯定与鼓励,更是引领全民节水新风尚的重要举措。

“中国节水奖”的设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其旨在表彰在节水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团体和企业,通过树立榜样,激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节水行动。这一奖项的设立,体现了国家对节水工作的高度重视,彰显了节水在保障国家水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表彰先进,可以激发全社会的节水热情,形成人人关心水、人人节约水的良好氛围。

“中国节水奖”的表彰活动,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和公众的广泛参与,获奖者的先进事迹和节水经验,将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节水意识。特别是在学校、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开展的节水宣传活动,使节水理念深入人心。例如,一些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参观节水设施、开展节水主题演讲比赛等形式,培养学生的节水习惯;一些社区通过开展节水知识竞赛、设立节水示范户等活动,激发居民的节水积极性。

然而,评选表彰“中国节水奖”,只是节水工作的一个环节。要实现全民节水的目标,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保护,制定更加严格的节水政策和法规,加大对节水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持力度。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和设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公众应树立节水意识,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中国节水奖”的设立和表彰,是推动全民节水的重要契机。让我们以此为契机,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共同为建设节水型社会贡献力量。只有当每个人都成为节水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节水才能真正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国家水安全而努力奋斗。

【券业观察】

## 证券业整合向强而行

王鸿鹭

中国证券行业正迎来新一轮深刻变革。随着“打造航母级券商”政策的深入推进,头部券商之间的强强联合将成为并购主流。这类并购的基本逻辑在于规模经济效应、业务互补与协同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理想的合并组合应当是在关键业务条线上形成互补而非简单叠加,例如机构业务强+零售网络广、投行见长+财富管理突出、国内实力雄厚+国际布局完善等组合方式。

同一实际控制人旗下券商整合是另一重要模式。中央和地方国资平台下的券商整合潜力尤为明显,这类整合的优势在于推动力强、实施阻力小,文化融合相对容易。

区域性券商联合重组则是中小券商的重要战略转型路径。通过区域内或跨区域联合,中小券商可以快速扩大规模,形成区域领先机构,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跨界并购也是重要趋势。国有券商引入民营资本、民营券商引入国资背景股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持续推进;同时,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对券商的战略入股也将增多。

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深化,跨境并购与国际扩张将成为大型券商的战略重点。通过并购海外券商或投行,可快速获得国际业务资质、专业团队和客户网络,但需谨慎应对文化融合难度大、国际监管复杂等挑战。

并购浪潮将显著提升行业集中度,加速资源向头部机构集中。未来中国证券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将逐步向国际成熟资本市场标准靠拢,行业将从分散竞争格局演变为“领军机构+综合型券商+特色券商”的多层次结构。

领军机构将在资本规模、业务多元性和国际影响力上占据优势;综合型券商将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多元化服务,在

某些领域形成特色;特色券商则通过区域聚焦、行业专注或客群精准定位等路径,在细分市场建立独特优势。

并购浪潮将引发券商业务模式和盈利结构的积极变革。规模效应将推动券商从传统通道服务向综合金融服务转型。盈利结构上,传统经纪业务占比将下降,投资交易、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业务占比将提升。

并购还将促进业务协同和交叉销售,合并后的券商能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提高客户黏性和单客价值。同时,券商将更加重视平台化、数字化转型。

并购浪潮的重要目标是提升中国证券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做大做强,中国券商有望在跨境并购能力、国际客户服务能力和国际业务创新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缩小与国际投行的差距。未来几年,预计将有若干家中国券商在亚太地区建立领先地位,并在全球特定业务领域与国际投行形成良性竞争。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投行行业经历了长期并购整合,最终形成了几家领先机构主导的高度集中格局。欧洲金融业则以混业经营模式为主,大型银行集团通过收购证券公司来扩张投行业务。日本证券业经历了从严格分业到逐步开放的过程,大型证券公司通过收购区域券商扩大国内市场份额。

国际经验对中国证券业的关键启示包括:行业集中是全球趋势;并购是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而整合是并购成功的关键;海外并购需审慎推进,文化整合是最大挑战;监管政策在行业结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小券商应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区域特色化是最传统也最实用的发展模式,立足特定区域市场,深耕本地资源,建立区域竞争优势。行业专业化是另一可行策略,选择特定行业或细分领域,打造专业服务品牌。客群聚焦是第三种路径,针对特定客户群体提供定制化服务,形成



警惕医生“科普”外衣下的带货生意

云诊室变小卖部,带货生意混科普。平台直播少障碍,马甲营销多话术。巨额利润很魅惑,凡人医德能兼顾?公众健康无小事,监管还需下功夫。

朱慧卿/漫画 孙勇/诗

客户黏性。另外,平台化和轻资本转型也是可行选择。面对资本实力不足的现状,部分中小券商可转向轻资本业务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和平台思维,构建开放生态。

主动参与整合比被动等待更为明智。实力较强的中型券商可主导区域整合;特色优势明显但规模有待提升的券商可考虑与互补性强的同类券商联合;发展转型中的小型券商可考虑与大型券商的战略合作或整合。

中小券商可采取“轻量化”科技战略,在核心业务环节重点投入。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云服务商等建立战略合作,引入成熟技术和解决方案,降低自主开发成本。在细分业务领域进行创新突破也是重要策略,如专注绿色金融和ESG投资等

新兴领域,形成独特的业务品牌。

伴随行业并购重组的深化,领先券商的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扩大,行业集中趋势将更加明显。同时,行业将呈现既有集中化趋势、又有差异化生态的复合格局。

券商业务模式也将发生深刻变革。轻资产与重资产业务结构将更加优化,财富管理转型步伐加快,跨境业务机遇与挑战并存,数字化转型将重塑业务流程和客户体验。

全球视野下,中国证券业格局重塑蕴含多重发展机遇。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为券商拓展全球业务创造条件,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上升推动跨境业务创新。并购整合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证券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绩效考核指标,且应有一定门槛,业绩指标完成情况需由独立审计机构鉴证。对于未设置关键业绩考核指标即发放奖金的行为,监管应明确视为违规操作并予以追责。同时建立“负面清单”机制,若公司出现财务造假、重大内控缺陷、行政处罚等情形,自动触发当年董监高奖金冻结程序。要从源头堵住“无功却领赏”的制度漏洞。

四是建立上市公司董监高绩效薪酬分配递延制度和追索追新机制。《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对高管未能勤勉尽责造成企业重大风险损失的,企业应将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部分或全部绩效薪酬追回,并止付未支付部分或全部绩效薪酬。上市公司完全可以参照借鉴上述机制,这有利于遏制董监高一些短期冒险、有损上市公司长远利益的行为。

有些上市公司规定,若董监高有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等情形,不予发放绩效奖金;但这些个性规定总体来说还缺乏具体规范或遵循。

另外,《准则》规定,董事和高管的绩效评价由董事会或其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组织,独董、监事的履职评价采取自我评价、相互评价等方式进行。董事、监事报酬事项由股东大会决定,高管的薪酬分配方案应当经董事会批准。这些对董监高薪酬的决策流程规定过于松、软、散,一般大股东本人或其指派人员出任董监高,由于一股独大等原因,中小股东对董监高薪酬议案的表决缺乏影响力,出现董监高薪酬自定现象。为完善上市公司董监高薪酬决定机制,建议:

一是要细化董监高薪酬与公司绩效挂钩规定。公司自治权应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缺失或模糊不清,让公司在高管薪酬等方面拥有过度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